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

—— 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周予同^①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经学”，有着各种不同的学派。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孺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之后，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遂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又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东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就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两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在这“大混乱”的时代，融合今文、古文为一体，即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的，正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的“郑学”（东汉末郑玄之学），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

魏晋时，王肃利用政治势力（他是司马昭的妻父），把所注《尚书》、《诗》、《三礼》、《左传》以及其父王郎所作《易传》，在晋立为博士。并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作为所撰《圣证论》的论据，企图夺取“郑玄学派”的地位，称为“王学”。西晋时，依靠皇室的支持，“王学”居于重要地位。

南北朝时，北方大地主阶级流亡南方，南朝盛行门阀制度，于是专讲区别尊卑亲疏的《三礼》学，最适合士族的需要，南朝经师曾采用郑玄的《三礼》注。但南朝沿受魏晋“玄学”的风尚，讲经兼采众说，也采取玄学，随意发挥；并受佛教的影响，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或讲义，编写出比“注”更详细的“义疏”；同时从《礼记》中抽出《中庸》篇来高谈儒家的“性命之学”，成为“南学”。至于北朝，则因留居北方的中小汉族地主阶级，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不敢大胆发挥，经义比较拘泥保守，《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墨守东汉旧说，不能别出新义，称为“北学”。

隋唐统一南、北以后，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折衷于南学、北学，政治上的统一促使了学术上的统一。“御定”的《五经正义》180卷，不但总结前人成果，并极力主张贵贱尊卑的区别，强烈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

北宋经学发展成为“理学”（亦即所谓“宋学派”），它是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独裁制度服务的。所谓“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四派，就是“宋学”的主干；而“闽派”的朱熹更是正统派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陆九渊提出相反主张，与朱熹对立。陆主演绎，执简驭繁；朱主归纳，由博反约。所谓“鹅湖之会”时的双方咏诗，“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终浮沉”（陆）；“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反映了两派治学方法的不同，但他们立场于哲学的见解，以理气心性作为论究的对象，而借助于经典的解释，维护封建秩序，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元、明以来，“朱学”因朝廷的提倡，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而陆九渊一派得王守仁（阳明）生力军似的加入，也颇得到一些学者的信仰。但这两派都是假借经学以谈理学，结果所谓“尊德性”（陆、王）的固然流于禅释，便是“道问学”（朱）的也空疏无物。

清初顾炎武反抗清朝压迫，反对八股和“宋学”，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到“明

^① 本文与汤志钧合写。

道教世”的目的，因而提倡恢复东汉古文经学。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清廷压迫的加重，士大夫便脱离了“经世致用”的实际，形成了所谓“汉学”（“朴学”）。它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称“吴派”，起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一支称“皖派”，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中的大义和哲理。这两派，近人又统称为“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他们从校订解释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艺术、科学；对于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不少的贡献。但多数都是脱离现实，考据繁琐，在政治上基本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在“吴派”、“皖派”盛行的同时，庄存与、刘逢禄等根据今文经《公羊传》来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称为“常州学派”，或称为“公羊学派”。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进一步利用《公羊》学，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又利用“托古改制”学说，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近人统称这一派为“今文学派”或“清代今文学派”。

这是中国经学史中几个主要学派的概况。由此可知，这些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集团的不同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在“经学”范围内的反映和斗争。

学派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实质上是思想体系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经”，是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其中亦有个别经学家的思想不属于统治阶级，甚或有利用“经学”进行革命宣传的）^①所以经学史中的学派，基本上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通过某些“经学”问题反映出来的具有一定共同点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集团的不同意识形态在“经学”范围内的反映和斗争。

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的一切形式总是带有阶级性的，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学派，它就表现了特定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和需要的思想体系，为本阶级服务。“在充满阶级矛盾的社会里，绝对不会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②由于“经学”基本上是历代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发展而展开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是历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披着“经学”外衣发挥自己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也就反映了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集团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斗争。

作为一个学派，是指具有特点大体相同的一些经学家们而言，单是一个人是形成不了学派的。因此，在整个中国经学史中，也有少数的例外：一种是某一学派中的某一人物，超出了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从人民的智慧中汲取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一种是其一学派在某一时期中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上行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前者可以东汉古文学派的王充为代表，后者可以近代史上利用今文经学展开改良主义运动的康有为为代表。但这些事例毕竟还是比较少数的。

举例来说，西汉景帝消灭七国以后，全国政治上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今文经学提倡《春秋公羊传》，其中“大一统”、“正名分”等“微言大义”，恰恰符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于是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罢黜诸子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今文经学派就因帝皇的提倡而形成而发展，并在西汉占有了政治上、学术

^① 周予同、汤志钧：《“经”·“经学”·经学史》，见《文汇报》，1961年2月3日。

^② 列宁：《做什么》，见《列宁文选》第1卷，苏联外文出版社1950年中文版，第211页。

上的优势。今文经学派的“大师”也因此“跻名公卿”，或列为“博士”。所谓“今文十四博士，”^①实际上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经学”形式为封建统治服务，适合地主统治的需要。又如北宋统一以后，鉴于五代的篡弑剧烈，“人伦大坏”，尤其是君臣一伦几乎不再存在。为了巩固其统治权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独裁制度，便特重伦理思想、提倡“忠、孝、节、烈”，宣扬儒家“三纲五常”为“永恒真理”，保护家族宗法制度的“宋学”，便完全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样，“宋学派”也就逐渐由形成而发展，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了。所以，中国经学史中学派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赋有时代的特点，无可否认地带上了阶级的烙印。

中国经学史中学派形成的另一特点，是它对经书阐释重点的基本一致性及其前后的师承关系。我们认为：思想体系的变化决定于基础的变化，但这并不否定思想体系发展中的继承性，也不否定利用过去思想遗产的可能。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在继承前人的经学遗产时，汲取过去经学家阐释经书的方法论，形成其治学方法上的一定共同点，反映了经学范围内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例如西汉的今、古文学派和清代的今、古文学派、北宋的宋学和元明的宋学，就其历史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但就其治学方法上的注重点来说，却又有其基本一致性。清代的今、古文学派曾利用和汲取了两汉今、古文学派的思想材料；元明的“宋学”也曾利用和汲取了北宋“宋学”的思想材料，这便有其某些共同之处。概括地说：今文学派（汉代的或清代的）以孔子为政治思想家（“素王”），以五经（六经去乐）为孔子“致治之术”，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派（汉代的或清代的）以孔子为史学家（“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派（北宋的或元明的）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儒家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理气心性，其特色是“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非但如此，由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是在“经学”范围内依据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阐释议论而形成学派的，因而，无论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宋学派，也无论两汉今古文学派、清代今古文学派，北宋的宋学派和元明的宋学派，尽管他们对经典的看法不同，尽管他们对经书中的中心人物孔子看法不同，但是他们的主要依据，却基本上没有越出儒家经典的范围，并且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为本阶级服务。因此，中国经学史中的各个学派，还是有其相互的共同点。

对于这些学派的相互共同点和基本一致性，完全不加考虑，显然是不对的；但只注意到这一方面，抽去了阶级分析的内容，却又陷于形式主义的比附，而不可能探寻各该学派的思想实质了。

因为，这些学派所“继承”的，每每是“经学”中的某些形式，如果不把他的“外衣”剥开，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学派形成、发展及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学派的“继承”中，又是包含着阶级性的。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经常利用和凭借以前的思想材料和继承以前的某些治学方法。但，它们却又是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其特点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的。在“继承”关系中，又深深地存在着阶级性。这种“继承”关系有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学派在形成时有其进步倾向，但在发展时却变成落后

^① 西汉时立于学官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如《诗》立齐（轅固生）、鲁（申培）、韩（韩婴）三家；《书》立欧阳（伯和）、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礼》立大戴（德）、小戴（圣）二家（另有庆氏《礼》，据说《后汉书·儒林传》未立于学官，所以不在十四博士之内；但亦有人据《汉书·艺文志》去《易》的京氏而代以庆氏《礼》的。）《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春秋公羊》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家，称为“今文十四博士。另有《春秋谷梁传》，宣帝甘露间始立为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内。

或反动的了。像清初顾炎武想用“经学”来保存民族意识，扛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抗击元、明“宋学”，“复兴”古文经学，希望文字流传，人心不死，汉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清联结，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是清代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但是乾隆、嘉庆时期，继顾氏而起的经学家，却“继承”了他的音韵训诂，而放弃了他“读经致用”的本意，学者为考据而考据，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他们在文字训诂和考据工作方面虽有些成就，但在政治上却是落后的了。很多的古文经学家，还为“御纂”的《四库全书》馆所罗致，校订了不妨碍清朝封建统治而又“有利”于“世道人心”的《四库全书》了。另一种情况则是学派在形成时原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又因社会经济的变动，代表了当时有一定进步倾向的阶级利益。例如清代今文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庄存与、刘逢禄，揭橥了《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利用这些“微言大义”来说明“一切既受命于天，故宜畏天命，需应天顺人，示人以拨乱反正，”^①要人们在清朝做顺民，以应“天命”。而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则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严重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也揭橥了《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但他却利用这些“微言大义”来“托古改制”，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代表了“一部分开明地主和一部分和大工业有若干联系而在政治上带有若干自由主义色彩的大资产阶级”^②的利益，与完全代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庄存与、刘逢禄有所不同。他“继承”的只是今文学“微言大义”特点的形式，而实质上却是披着经学的外衣，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工具了。

固然，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材料时，有的比较拘泥“师法”，坚守“门户之见”，与现实接触较远；但有的则从“经学”中找出自己需要的材料，他们的政治倾向性便较明显。我们能不能对前者毫不批判地只阐明其继承性而不分析其阶级性呢？显然是不能的。如上述的清代今文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龚自珍、魏源汲取今文“经说”，规划天下大计，援引《春秋公羊传》，议切时政，排斥专制。这种思想，后来发展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而戴望、邵懿辰等则主要“继承”西汉今文学派的某些治学方法，“严守”今文义例，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讲究今文师法的“经学正统”。难道戴、邵就一点没有政治主张，真的完全是为学术而学术吗？那也不是的。只要看邵懿辰与曾国藩“交二十余年，”^③见曾国藩“进官之速”而赋诗勉之。^④等到太平军攻破杭州时，还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与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犹为心之安乎？”^⑤戴望亦“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⑥并劝曾“功名成就，急流勇退。”^⑦他们与清政府的忠实走狗、杀人刽子手曾国藩都有“渊源”，能说他们是不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利益的吗？所以以“学派”中那些坚守“门户”、拘泥“师法”的人，每每在学术上是比较保守，在政治上也会是此比较保守的人。

因此，根据经学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对某些“经学”问题的一定共同点的思想体系而形成的经学派别，而这种派别归根到底又受经学家的世界观的直接支配。这些经学的流派，就其“继承”的形式来看，有其师承关系或治学方法的基本一致性；但就其本质来说，是有其阶级性的，是和时代的特点密切关联的。

明确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正确地透视各该时代学派与学派斗争的根本症结。他们争论的是“经典”中的“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他们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所以，学派与学派之间以“经学”为形式

^① 大意见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第30页。

^②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

^③ 曾国藩：《邵位西墓志铭》。

^④ 邵懿辰：《半岩庐遗集·遗诗·五言古诗》。

^⑤ 马新贻：《奏为在籍京员守城殉节殒阵死事情恳恩敕部议恤折》，见《半岩庐遗集》卷首。

^⑥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记。

^⑦ 马叙伦：《石屋余瀋》，第161页。

所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学派斗争时所反映的社会变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旧“学派说”批判

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撰著中，对中国经学史中学派的区分，每每只从“经学”继承的形式上来说明派别。如清乾隆年间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总部总叙》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它简单地只从学派的“继承”关系及其某些特点着眼，丝毫不加考虑它在不同时代的区别性，笼统归派，混同拼合。试问：能说元明的“宋学”和北宋的“宋学”完全一致吗？能说两汉的今、古文学派和清朝的今、古文学派完全一致吗？社会存在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人们的意识是由社会存在产生并受它制约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存在。封建地主阶级看不见人们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必然得出来错误的结论。

即使比较进步的思想家，看到不同时代中学派的不同特点，但也还是侧重在“师承”关系上的探寻，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提出“清学”非“汉学”说，主张将清代经学从“汉学”中分出。他说：

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按指江藩所撰之书），名目有不安焉。改名《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齷齪，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以概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禘灶梓经之言为经，因以之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①

按他所谓：“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的，如文字音韵之学，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即其一例。所谓：“有汉人未开之门径”，如清代的金石学等。所谓：“别有绝特之士，创获于经，非汉非宋”，如戴震《孟子字义考证》，用训诂学的形式以探求《孟子》“本义”，痛斥当时代表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又如焦循的《雕菰堂易学》三种（《易通释》、《易章句》、《易略》），便是“涵咏白文”，以己见讲《易》。这些，就是他将清代经学从“汉学”中分出的主要论据。可见他还是从学派的继承关系和研究特点来区分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撰著中，非但不可能正确理解经学史中学派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并且在他们的分派中，又反映了各该阶级的政治立场，分派之中也曾包含着斗争。

《四库全书》编纂时，清朝崇奉的是宋明理学，但他并不排斥脱离现实社会极远的古文经学，并罗致一些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参与校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指的“汉学”，实际是古文经学；所指的“宋学”，实际是“程朱之学”。前者注重“训诂疏证”，对封建统治无碍；后者宣扬“三纲五常”，足以保护封建专制制度。他的分为“汉学”、“宋学”两派，应该是根据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库》

^① 龚自珍：《与江子屏（藩）书》，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页。

编修宗旨加以区分的。而这两个学派，也是得到封建政府的“提倡”或“默认”而“合法”发展的。他们的有关著作也是封建政府认为对“君臣大防”、“夷夏大防”，没有妨碍而被编写进去的。

至于龚自珍的将清学从汉学中分出的主张，除掉他主要从继承关系上提出上述论点外，亦有其社会原因。由于清朝道光时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政治腐败，危亡可忧，龚氏看到社会的奄然无生气，而提出“更法论”，说：“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侈，以俟踵兴者之政改图耳！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①他的揭橥“清学”，也不能不说与他的不拘泥古训有关，不能说与他的维新倾向完全无关。

这里还可以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叶德辉两种根本不同的“经学”分派说中，看出他们不同的阶级立场。

康有为说：

夫古学所以得名者，以诸经之出于孔壁，写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虚，古文亦赝，伪而已矣；何古之云！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学所以售其欺伪者也。今罪人斯得，旧案肃清，必也正名，无使乱实。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后世汉、宋互争，门户水火，自此视之，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②

康有为将“汉学”专指“今文经学派”，而斥“古文经学派”为“新学”，即“新莽之学”。康有为为什么专指“今文经学派”为“汉学”呢？因为他要利用过去今文经学的思想材料“托古改制”，要从西汉今文经说中去找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以为今文经学派是得到孔子的“真传”的，是“真正”的“汉学”，不是“伪学”。为什么斥古文经学派为“新学”，“宋人所尊述之经”为“伪经”呢？因为这两个学派在当时学术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得到封建政府的“合法”提倡或“默认”，而他们又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成为保护封建制度的毒品。于是他将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企图在不根本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湖南的顽固劣绅叶德辉也有一种“经学”分派说，他将“经学”流派分为今文学、古文学、郑氏（玄）学、朱子（熹）学四派，说什么：

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秦火之厄，汉初诸儒，壁藏口授，萌芽渐著于竹帛。当时读者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今文者，对古文而立名也。自后古文之学，则为大宗。门户纷争，互相攻驳，至有父子异学，同乡相非，如刘歆之于刘向，梁丘贺之于孟喜，甚可笑也。故终汉之世，师说愈盛，而经学愈衰。至郑康成出，始一扫而空之。于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经生之拘陋。当时弟子遍于齐鲁，传衍递于三国。至南北朝时，其学尤大行于河洛间。故唐以前之经学，唯郑氏为一大宗已。五季之乱，图籍荡亡，北宋诸贤，如欧、苏、王、刘、永嘉诸公，五经皆有传注。其弊至吐弃一切旧文训诂，自创新义，以为得圣学之真传，而荒经残古之风于是乎益炽。迨朱子乃力纠其失，兼取汉、唐诸儒之长，其学洞贯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书，以补传注之未备。又喜校勘古书同异，搜罗逸文，……故近儒著书之法，皆朱子学也。^③……

叶德辉在戊戌变法时期，与王先谦等勾结，极力破坏维新运动，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七。

^②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

^③ 叶德辉：《皮锡瑞六艺论疏证序》，转引自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64—66页。

的民权、平等主张，说什么：

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①

说什么：

西人有君主，有民主。……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疮痍水火之中哉！^②

为了反对康、梁维新派，他又对作为维新派理论武器的今文经学肆予攻击，詈骂他们为“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③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他仍想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其失去头脑作用，驯服于腐朽统治之下。于是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学说牵合为一事，以抗击维新议政派。他的这种“分派”，也可说是封建顽固势力在维新派利用今文学说掀起改良主义运动时感到愤怒和恐慌的一种反映。

叶德辉和康有为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的经学“分派”的两种根本不同说解，表明了当时两个不同阶级的不同政治立场，在“分派”之中也就包含着斗争。

同时，我们从前引资料中，还可以看出，“分派”提出较早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④而“分派”争执较炽烈的则是戊戌变法前后。“分派”的提出及其争辩，也反映了清代中叶以后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

邓拓同志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指出：

“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候，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候。^⑤

较早提出“分派”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道光中叶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政治腐败，危亡可忧，龚自珍有着“清学”从“汉学”分出的不同说解。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分派”的争辩也就掀起。他们或者从过去的思想材料中找寻根据，以充实自己的“学派”内容，并厘清学派，以明本学派是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或者牵合各派中的封建毒品以与当时的进步思潮相抗衡。经学的分派，固包含着斗争；经学分派之史的发展，也明显地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经学史时经常接触到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我们在理论学习和材料掌握上都还不够深入和丰富，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但愿提供出来，希望读者加以批评和指正。

（原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

^① 叶德辉：《正界篇序》，见苏舆《翼教丛编》卷4。

^② 叶德辉：《论西学书法书后》，见苏舆《翼教丛编》卷4。

^③ 叶德辉：《轺轩今语评》，见苏舆《翼教丛编》卷4。

^④ 按《史记·儒林传》和《汉书·儒林传》以及后来的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以及各史“儒林传”等，虽曾提到一些经学的“师承”传授，但未明显分派。

^⑤ 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74页。